

MINGUO SHIQI MINGQING DANGAN ZHENGLI YANJIU

民国时期

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张会超 著

29
0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张会超 著

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张会超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12

ISBN 978-7-5100-4161-7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档案工作-文化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27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445 号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张会超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5911072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370 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161-7/G · 304

定价: 40.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序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作用。清初,满族统治者朝气蓬勃,虚心学习,尽管它曾经以落后的政治措施及野蛮的军事手段,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招致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抵抗。但是,清统治者集团能够很快学习汉族先进文化,调整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果断的措施,较快地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泱泱大国,比之汉唐,毫无逊色。

清代文化成就之一,是它的档案事业。档案是文化的产物,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有清一代极端的封建君主专制,以清初“文字狱”为代表,曾严重桎梏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仍按其历史规律,健康地、不以统治者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发展前进,因而造就了清代档案以极具时代特色的姿态傲立于中国档案文化之林。

清二百多年的皇家档案,保存在北京紫禁城内,还从盛京(清时沈阳)移来满文老档,统称“内阁大库档案”,几乎记录了有清一代全部历史。清档案形式多样、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弥足珍贵,它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大清历史,是认识、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民国时期对这些档案整理研究的意义,一般都从“八千麻袋事件”谈起,以示内阁大库档案被糟蹋成何等模样,其实,清档也随着清王朝自身的局限性,而历经坎坷,多所磨难。

清廷到光绪时没有专人管理档案,仅有内阁典籍厅和满本房分别兼管,据《光绪会典》记载及内阁大库的实际情况,大体是典籍厅掌管西库贮存的“红本”(即封面有红字书写皇帝意见的题本)及书籍、表章;满本房掌管东库保存的“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及其他档案原件,因此,此时内阁大库没有划一的保管制度。

所存档案皆打包结捆地堆积起来,无人问津,因内阁大库规定“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戒备森严,禁秘异常,真所谓“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致使这些档案几百年来“尘封插架”,禁锢于“灰堆积土”中。自清入关到道光朝二百年来,对库房从未拆盖修理过,以致库房因年久“木料糟朽,墙壁闪裂”,“院内地沟堵塞,每遇大雨,积水盈尺,无处渲泄”,“渗漏坍塌,几无完室”。

由于大内档案到了清末已经“木格已满”、“潮湿霉烂”,加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大库墙倾翻修,二月,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奏请“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检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置炉焚化,以清库贮”。经朝廷批准,内阁于三月二十五日决定,除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的正副本,不论是否霉烂,一律保留外,“其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仍着

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及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内阁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载于《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二),结果焚化大量大批光绪以前的清档。

宣统元年(1909年)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希望查阅清初多尔衮任摄政王时举办摄政大典时的档案以做参考,不料在内阁大库检寻不得,内阁官员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上奏请求焚毁,获得朝廷批准。不俟秦火,将沦劫灰。

此时,管理学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闻知此事,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清朝档案汇编,如“起居注”、“实录”、“圣训”、“方略”等拨交学部,设学部图书馆(后改为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后来溥仪的老师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选书籍和档案。罗振玉见档案随便堆放在文华殿的西庑,多为“红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

罗振玉随手抽出两束档案来看,其中一束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的奏折,另一束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时的奏折,两束极为珍贵。罗振玉听说要焚毁这些档案,他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朝廷批准,将这些档案移存学部,这是内阁大库档案第一次流出宫外,导致后来窃卖“八千麻袋”清档事件。

张会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详尽地讲述了“八千麻袋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再赘述,只想说,来不及迁到学部的大宗档案仍堆放在残破的宫中大库内。经历“八千麻袋”厄运后,这批劫后余生的档案多残缺不全,被浸污漫漶,不少关键部分模糊污损,不下相当大的功夫鉴辨整理,无法利用。

1979年,本人参加《清初漕赋档案史料》的编纂,见不少顺治朝题本,上有各省征收漕粮数字,正是我所急需的,无奈有的数字已难以辨认,有的数字虽清楚,但年月日不清,不能用彼时的档案来说明此时的问题,否则会导致结论的荒谬,甚至适得其反,因而忍痛割爱。

由此可知,清亡后,民国时期,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大声疾呼、亲自参与对清代档案(包括少量明档)的鉴辨、整理、编纂,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伟业。张会超选择这个专题研究、著述,亦是一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学术活动。

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至1933年故宫文物、文献南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学者们克服重重困难,运用比较先进的档案整理方法,完成了数量惊人的档案整理,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功侔鲁壁的。但是,由于防止日本侵略者掠毁这些国宝,又是在先贤们“八千路云和月”的努力下,抢运到南方,后因战乱,辗转迁到台湾,使明清档案天各一方,令人扼腕叹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有关学人很少知道民国时期各位学者对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偶有涉及,亦批判多于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档案局根据中央决定,开放历史档案。清档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海峡两岸学者在利用清档时,都痛感不便,渴望了解对岸档案状况。

1992年9月,国际著名清史专家陈捷先教授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海峡两岸清史、清档研讨会”,两岸清史界、档案界学者济济一堂,我亦受邀光临此会,这是两岸学界首次就清档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会上,两岸学者各自介绍了清档的保存、整理、利用及编纂情况,大陆客人更关心成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后对清档的整理研究,尤其档案南迁后的情况,那个时代,大陆有关资料及著述是很少的。

陈捷先教授等陪同我们一行除了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还去了台湾“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等单位,见到清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保护措施也很好,如看档案原件,必须戴口罩和手套,那时在大陆很多档案馆,尚无这么严格的规定。尤其我们见到了悬挂在墙上的档案界前辈的照片,如张继、李煜瀛、王国维、沈兼士、罗振玉、蒋廷黻、范源廉、易培基、傅斯年、罗家伦、马衡等等,他们当年为抢救明清档案所付出的心血,在我们眼前油然而生。

历史在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学术领域的扩大、档案事业的发展、两岸交流的加强,现在有关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各方面资料,已俯拾皆是,但是,多散见人物传记或有关论文中提及,尚未见系统地论述之专著。

张会超是我的博士生,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作风朴实、待人坦率,是我带的研究生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也是发表学术论文最多、质量最高的博士生之一。

我对他的最初了解,是在审阅他考我院博士生的入学试卷时,引起了我的注意:试题有关历史档案的编研问题,他不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以及简牍档案,均知之较伙。因属匿名阅卷,当时尚不知这位考生何许人也?只感到他是个很有学术前途、殊堪造就的青年。后来成绩公布,榜上有名,他进入我院深造,由于他顽强进取,有今日之成果,就是必然的了。

他写的《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史论相佑,发凡起例,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继而落笔写当时档案前辈“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筹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以重笔叙述了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前辈专家学者,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并从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

对于张会超研究的这一课题,中国大陆也仅仅刚起步,很多有关的档案史料也有待继续挖掘,很多相关理论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和完善,尤其对有些人物的评价还应更全面、客观。因而,张会超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勇于开拓这一学科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

张会超在本书展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还在于,民国初期,中国自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下,进入到更为腐朽、专制的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这一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期,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以及彪炳千古的学术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关明清档案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因而,张会超的有关著述,是为这些学者竖立的一座丰碑,亦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学术成就,希望这部书为今后两岸学者共同研讨一个专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希望张会超继续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刘耿生

2011年3月28日

摘 要

明清档案是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清朝宣统年间,一部分内阁大库档案被转移到国子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军机处档案又被转运到中南海保管。而“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明清档案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有志之士积极行动,罗振玉率先出手抢救。由此拉开了明清档案系统整理的帷幕!基于还原过程、展现细节的考虑,本书试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作一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整理过程蕴涵的档案思想及其学术意义。本书分上下两编6章进行阐述,上编4章重在构建史实,下编2章旨在进行理论探讨。

第一,明清档案的早期整理。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把存放于午门和端门的内阁大库档案当作废纸卖于纸店。罗振玉获悉后,出资赎回,然后就招人检理,并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而后罗将其大部转卖于李盛铎,同时还卖了一些给日本人,他自己留下的一部分则随后带到了旅顺,并成立了库籍整理处,聘请中外人士进行整理。这批档案后来有部分被捐赠于奉天图书馆。而李购买内阁大库档案后,并未详加整理,只是于1928年12月转让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该事件的发生,使北京大学的学者注意到了档案的散落,于是要求教育部把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任务交付于北大。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获取存放于历史博物馆的内阁大库档案后,便成立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会”。“整理档案会”商定了整理方法,就组织人员从1922年7月4日起开始整理这批档案。从此,北大“整理档案会”不断改进整理方法,吸纳北大师生参与这项活动。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在报刊上公开了整理报告,并举办了档案展览,扩大了明清档案的影响。截止到1924年5月,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进入到注重档案内容以及整理出版阶段,并将“整理档案会”改名为“明清史料整理会”。

第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初期整理。1924年11月5日,久居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随之成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开院典礼,其图书馆下设文献部,沈兼士主持部务。文献部成立伊始,就开始了明清档案的集结工作。而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从国务院处运回了存放于中南海的军机处档案,立即中断了朱批奏折的整理,进入到军机处档案的整理工作中。1927年11月,文献部改易为掌故部,继续从事档案的整理及相关工作。因为北京时局的变化,使故宫博物院改组。1928年10月5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立。文献馆的设置,使明清档案的整理进入到新的阶段。之前的拓荒时期局面得以改观,进入到了扩大整理阶段。这一阶段则是按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及其他档册书籍五大类进行整理,除了基本的整理外,同时还进行了库房陈列、提供查阅借抄、编纂出版等多项工作。“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故宫博物院担

心起了文物的安全问题。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决定将文物迁移。1933年初日军南侵,形势危急,故宫博物院便将装文物的箱子南运。文献馆南迁的档案及其实物共3773箱,存放于上海英租界。

第三,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后续整理。档案南迁后,文献馆对留院的档案继续整理,不仅按照五大类别从事整理及相关的工作,而且对于档案整理的原则方法也进行了更新。1934年7月,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和系统分类的原则,对档案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整理。随之进行的,还有不断探讨分类方法的科学化,1936年6月制订出了《整理档案规则》,而后摸索出了适用的档案十进分类法,40年代终于出台了《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简表》。此时北平早已陷落,文献馆的职员在艰难险恶环境下,坚守岗位,继续进行整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同仁在坚持的同时,另一路人马则随着南迁档案进行疏散。故宫南迁文物在“七七”事变后进行了西迁,分三路转移。文献馆档案则是中路、北路两路并发,从1937年11月开始,至1939年9月,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存放于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处。文献馆档案保存于两地直到抗战胜利,才聚集重庆,后沿江运至南京朝天宫。刚在南京不到一年,由于淮海战役的白热化,国民政府决定将部分文物运至台湾。文献馆二百余箱档案被运送到台。而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整理及相关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故宫被接管,而工作人员留任。至此,文献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第四,其他单位的整理。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随即着手购买李盛铎手中的内阁大库档案。1929年9月,档案聚集于午门城楼处。史语所便组织人员开始整理,并制订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规则》,采用七项程序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至1932年底,档案整理初告胜利,进入到档案内容研究的阶段。与整理同时进行的则是编纂出版工作,1930年9月《明清史料》甲编前两本印刷出版,以后则循序渐进。但因时局恶化,史语所将档案装箱南运。虽然一度开展工作,但终是断断续续。后因解放战争的推进,史语所迁台,部分档案随之东去。继中研院史语所的整理之后,清华大学和禹贡学会也先后加入到整理的队伍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蒋廷黻先生的主持下,购买了大量的清代档案,由工读生吴晗等人进行整理。可惜,随着抗战的胜利,这批档案失去了踪迹。而禹贡学会亦于1936年6月从坊间购买了大批档案,并着手整理,但好景不长,同年12月,被财政部档案保管处赎回。原来该档案是财政部档案保管处当作废纸出售的,但因事情暴露,迫于压力,只得收回。

第五,实践过程中理论的凝结。在对上述档案整理实践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档案整理的一些理论。档案整理需要规范,只有合理的制度才能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虽然有各自的原则,但其对档案的重视却是一致的。档案分类和编目也因时宜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借鉴国内外的图书和档案分类法,而采用了适合自己的方法,但内中表现出来的档案思想值得后人尊崇。在对档案进行保管和整理的过程中,档案思想体现了出来,升华为近代档案学的思想源泉。其中,档案价值的认识、分类编目方面的观念,以及编纂公布的见识,都是档案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档案思想,是当时参与明清档案抢救和整理人士的动力和指南,更成为近代档案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第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从1922年罗振玉率先抢救流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到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和禹贡学会的陆续加入,明清档案得以保全,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明清档案的整理,不仅是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予

以条理化和秩序化的过程,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档案的整理首先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工作经验,从积极借鉴国内外的相关做法,到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同时还培育了大批人才。在提供经验的同时,整理活动还遗留了一些教训,值得反思和学习。明清档案的整理对学术界和社会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北京大学整理期间的与报社辩论到远在江南的章太炎先生查档事件,就说明了当时整理活动的影响。而文献馆长期的提供查阅和借抄,则满足了学术界的档案需求。北平社会调查所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里,从各个保管单位里抄录了12万件档案。明清档案整理还成为我国档案学产生的助推器。我国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明清档案整理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档案学创立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践到理论,本文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做了研究。通过这项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事实,填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较为系统地再现当时的状况,而且探寻了当时众多有志之士致力于历史档案整理的心态和观念,彰显出了他们的档案精神,足以令后人学习!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不仅是档案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对待历史档案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

Abstract

Mingqing Archives are historical archives produced in the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One part of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was transferred to Board of Educ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archives in Council of State were stored in Zhongnanhai after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n the occurrence of “the event of eight thousand burlap bags” made Mingqing Archives into the vision of the public. Therefore some people began to rescue those archives, and Luo Zhenyu firstly bought these archives sold by Education Ministry of Beiyang Government in 1922. So the prelude of the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ope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thesis wants to expound the process and details of the arrangement, and explore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ctivity, and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Part One: the early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Because of shortage of the fund, Education Ministry of Beiyang Government sold th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preserved over the buildings of the Southern End Main entrance and Meridian Gate as waste paper in 1921. When heard the news, Luo Zhenyu bought these archives, and recruited some persons to arrange the archives. Then Luo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boo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 Later Luo sold most of these archives to Li Shengduo, also sold part of them to Japanese. Finally Luo carried the archives leaved by himself to Lvshun in 1928. In 1933, Luo invited some people to arrange the archives. After arranged, these archives were donated to Fengtian Library. Although Li Shengduo bought the archives sold By Luo Zhenyu, he didn't almost arrange them. And Li sold these archives to 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in 1928. That is “the event of eight thousand burlap bags”. It is the event that made the scholars of Peking University notice the archives scattered. They required Education Ministry to deliver the task of arrangement to Peking University.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obtained th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preserved in the Historical Museum, then established a organization of arranging th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in Qing Dynasty. The organization discussed the methods of arrangement, and began to arrange the archives from July 4, 1922.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arrangement, the organization published the report of arranging archives in the newspaper, and held some exhibitions on these archives. These behaviors influenced society more. The arrangement didn't gain a series of success until May, 1924. Then the organization changed its name for Arrangement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and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try to publish the archives.

Part Two: the preliminary arrangement of Document Library in the Palace Museum. When Puyi was derived out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ommittee of dealing with things about Qing Dynasty was set up, and then the organization began to check the goods of palace. One year later, the Palace Museum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10, 1925. There was a Department of Document under the library of museum, whose affairs were presided over by Shen Jianshi. Department of Document aggregated immediately archives placed in the everywhere of museum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he Palace Museum got the archives of Council of State conserved in Zhongnanhai in January, 1926. Soon the department of Document interrupted the arrangement of Palace Memorial and began to arrange the archives come back. In November, 1927, the Department of Document turn into Zhanggu Department, then the new department continued arranging Mingqing Archives.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alace Museum was reorganized in 1928, and Document Library was also set up as a branch of museum at the same time. The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came into new stage from the moment, and the colleagues arranged Mingqing Archives according to five categories. These kinds are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archives in Council of State, Imperial House – hold Department Archives, Palace Archives, and other archives. At the same time of arrangement, Document Library are engaging in other work, for example, exhibition, providing utilizatio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etc. After September 18 Incident, the Palace Museum worried about the safet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sent requests to National Government of Nanjing. Getting the permission, the museum started to pack the relics. When the situation became serious in early 1933, the Palace Museum transported the relics to Shanghai by train. The number of wooden box of Document Library was 3773.

Part Three: the subsequent arrangement of Document Library in the Palace Museum. After the partial archives of Palace Museum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the part remained in Beijing got continuous arrangement. The arrangement not only complied with five categories, but also change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Document library determined the general and systematic principle in July 1934. Then the staff continuously researched scientific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 After July 7 Incident, Japan completely invaded China. The aggression made the relics what had been transferred from Shanghai to Nanjing move again. The archives placed in Nanjing were carried safely to Southwest of China finally, and stayed in different places for almost four years. These archives were not carried back to Nanjing until after Anti – Japan War Victory. As for the archives what stayed always in the Palace Museum during the Anti – Japan War, the workers still insisted on arranging them even being in difficult period. They went on working in the Document Library after October 1945. Because of Liberation War, the relics were carried to Taiwan from the end of 1948 to the early of 1949. More than 200 Boxes archives were moved to Taizhong.

Part Four: the arrangement of other units. After 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 in Academia Sinica established in October 1928, it tried to buy Imperial Cabinet Archives from Li Shengduo. When the archives were aggregated to the building of Meridian Gate in September 1929, the institute began to arrange them. The work got a preliminary success in the end of 1932,

and then entered the stage which laid stress to the content of archives. But the arrangement was broken down by the aggression of Japan. 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 began to migrate with archives in search of better environment in the end of 1948. Besides Academia Sinica, there wer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Yugong Society which participated in arranging the Mingqing Archives. The dean of History Departmen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Jiang Tingfu, bought a lot of archives from the markets during the 1930's, and then let students arrange them. Wu Han participated in the arrangement as a student. It is pity that the archives disappeared during the Anti-Japan War. Yugong Society bought many Mingqing Archives from the shops in June 1936. The Society arranged the archives immediately. However the archives were redeemed by Archives Storage Agency of Finance Ministry after half a year.

Part Five: the condensation of archival theory in the arrangement. The article came to conclusion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practice of archival arrangement. Arranging archives need standards and rules, so the thought and idea displayed gradually dur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arrangement methods. Although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had respective method and principle, there was an identical point that everyone all paid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Mingqing Archives. The institutions on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 made people arrange the archives successfully, although they were different. The formation of methods had studied other domestic and overseas methods for reference. The thoughts of Mingqing Archives appeared gradually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and they were the realization of archival value, concepts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 idea of compilation and public, etc. The thoughts turned into progressive power and guide, and becam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rchives science in modern of China.

Part Six: the effect of the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Mingqing Archives were arranged by Luo Zhenyu, Peking University, the Palace Museum, 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 in Academia Sinica,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Yugong Society from 1922 to 1949. The arrangement not only gave the archives orderliness and sequence, but also had important effect. The experiences included reference to domestic and overseas methods, improving methods, and training talents, and the lessons were worth review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enlarged the effect of archiv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ademic circles recognized gradually the importance of archives, and began to use them. The institute of investing on society in Peking made a copy of archives more than 120 thousand from 1930 to 1937. The arrangement became the important promoting force. And the archival thoughts came to be a significant part of archives science in its establishment time.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great cultural project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The author does its best to giv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fill in the research blanks. Now we can know historical facts and understand the idea of archivists through the paper. The arrangement of Mingqing Archiv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t only is the important part in archival history, but also supplies a model to us.

Key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ngqing Archives; Arrangement

目 录

前言	1
1. 选题意义	1
2. 研究现状	2
3. 研究思路	3
上编 实践篇	5
1 明清档案的早期整理	7
1.1 “八千麻袋事件”解析	8
1.2 北京大学的整理	17
2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初期整理	36
2.1 拓荒时期	36
2.2 扩大整理时期	49
2.3 档案南迁	66
3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后续整理	70
3.1 精进时期	70
3.2 战局下的守成	89
4 其他单位的整理	104
4.1 中研院史语所	104
4.2 清华大学历史系	118
4.3 禹贡学会	122
下编 理论篇	129
5 明清档案整理的理论凝结	131
5.1 档案整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131
5.2 整理过程中档案思想的升华	154
6 明清档案整理的意义	171
6.1 经验与教训	171
6.2 对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	186
6.3 对档案学的促进作用	196

结语.....	202
附录.....	204
1.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	204
2. 文献馆所藏档案分类简表	205
3.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编印成果一览	213
4.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研究成果一览	215
参考文献.....	218
论文后记.....	227
出版后记.....	229

前言

1. 选题意义

中国档案学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档案学的兴起与民国时期史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当时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以及近代档案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不无关系。关于“行政效率运动”,档案界从学科视角已经做了很多的探讨,而近代档案教育也屡屡有所提及。唯独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叙述的并不多见。档案界在这方面的失语,造成了其学术研究的旁落。档案学界多在探讨实用的理论和方法,使得过去的景象正逐渐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大家都在积极地向前看,这没有错,但是,在前行时,我们还需要回顾过去,去看看曾经走过的路是否笔直、平坦。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先生的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而他对近代四大史料发现的总结和展望,显示了他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内阁大库的书籍档册则是当时明清档案的缩影。甲骨学、简牍学(简帛学)和敦煌学已经成为了显学,而明清档案学迟迟未能发展壮大,岂不悲哉?

随着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和发展,明清档案事业面临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为清史纂修服务的同时,明清档案的管理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是,这一步走向何处、如何走,就需要判定。有必要从以往的历史看起,结合现实、展望未来、确定目标和方向。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无疑是一种参照物。

中国档案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学术史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为什么中国形成了档案学,而没有形成档案馆学?当时档案学的兴起与明清档案整理有多大的关系,影响有哪些,都是未解的问题。也许从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可以窥出一二。

所以,为了了解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真相,不至于使它们消失在飞逝的岁月中,更为了探讨明清档案整理与档案学之间的关系,还为了给现在的明清档案整理提供一个思路和借鉴,有必要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做一番探讨。

“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乎做学问时的目的。”顾颉刚先生洞晓此理之后,就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他也

因此说:“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古史辨自序》)前贤们的心得告诉我们研究是一种兴趣,也是一个过程。出发点固然重要,但兴趣同样也不可少。只有二者紧密结合,再加上方法得当,也许就会成功。中国档案史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则是联系古代与现代的纽带与桥梁,可以借此上溯明清两朝的档案整理情况,也可以对今天档案的整理提供经验与教训,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2. 研究现状

对于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学术界有一些探讨。从整理开始,就写出了许多文章,阐述当时的一些情况。这些文章和报告散存于各种刊物中。比较集中的有《文献丛编》、《文献论丛》、《文献特刊》、《文献专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刊物。这些参与者所书写的材料记录了当时整理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能从中窥探出些蛛丝马迹。比如,《文献丛编》上刊载的从1934年8月到1937年6月的22份详细工作报告,可以突现出当时的工作情形,而单士魁先生的《清代档案丛谈》与其胞弟单士元的《故宫札记》和《我在故宫七十年》则汇集了当年他们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反映了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更促使我们要向前辈学习,勇于探索,积极进取。

而沈兼士先生的《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方甦生先生的《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张德泽先生的《档案分类研究》和《整理档案问题》等文则是对当时整理情况的一种总结和探讨,档案分类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至于尹石的《明清两朝档案考略》和王培仁、高良佐等人的《北平文化机关明清档案考察记》则是系统介绍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的文章。罗振玉之子罗福颐的长篇论文《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是目前能见到的最系统最详细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著作。该文用11章阐述了大内档案的整理,特别是阐释了罗振玉和沈阳博物院对明清档案的整理。这篇六十多年前的文章,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和作用。而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则继承了其祖父整理大内档案的衣钵,对当时留存于旅顺的明清档案做了整理,并编辑出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从学术上看,罗氏子孙三代的这种档案情怀是值得颂扬的。

一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使我们看到了当时整理的规则与标准。那个时候整理并不是盲目地蛮干,而是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从当时参与整理的人员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界名流对这批档案何其重视。从《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一览》中的专门委员组成名单中可见一斑。《一览》更是告诉了我们1932年之前文献馆所做的诸多工作,从档案的整理到陈列,还有大量档案的编辑出版。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成为中国人的耻辱日!国难当头,档案也概莫能外。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妥善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文物南迁。于是,包括明清档案在内的故宫文物进行了国宝大转移。从1937年开始,中国进行了8年的抗战,而明清档案则流离颠沛了14年。从1933年初运出故宫博物院,到1947年云集南京朝天宫,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置身其中才能体味。今天,对档案的南迁,档案界叙述的不多,但文物界对此做了很多的探讨,可以借他们的研究蠡测一二。《故宫沧桑》、《典章故宫国宝七十年》、《故宫往事》和《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等书有所阐述,值得参考。而战局的变化,使存放于南京的文物精品被运往了台湾。政权的更迭,令海峡两岸的文物和档案隔海相望、一分为

二,至今不能团聚。在台湾的庄吉发先生曾对台湾所保存的故宫档案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书《故宫档案述要》用了7章来阐述宫中档、军机处月折包和档册、内阁部院以及史馆现存的档案史料,分析了其内容和价值,值得一阅。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举办了三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人士对两地清代档案的整合、管理与利用做了诸多研究。会议上提交的一些文章值得学习和参考。

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获得了新生。文献馆也于1951年改为档案馆,正式成为了专门的档案机构。虽然以后其名称和隶属关系有所改变,但其职能并未大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逐步开始了对明清档案的精心管理,从收集到库房保管,再到大规模整理和编辑出版,以及对外提供利用。但从今天公开出版发表的各种论著来看,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缺乏系统的研究,仅在个别地方略作阐述。比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只用了数页简单介绍了过去的情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学术环境等种种问题的局限,能对过去的情况做一叙述已是难能可贵的事了。倪道善先生的《明清档案概论》和秦国经先生的《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和《明清档案学》亦略对这一整理事件做了简要的介绍,他们均着重说明现有明清档案的分布与其价值,秦先生还探讨了明清档案管理的一些内容。邓绍兴等人的《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对这一时期的档案分类做了详细的说明。

近来对这一块的研究并未完全沉寂。梁继红老师曾于2000年写出了名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编辑研究》的硕士论文。这是迄今为止,新时期内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所做的较为系统的一次研究。除此之外,各种杂志期刊上登载一些相关的文章,比如,有对单士元、单士魁和张德泽等几位当年的参与者所做的访问。较多的则集中在对当时大内“八千麻袋事件”的叙述和探讨。比如,朱瑞芬女士就从鲁迅、罗振玉和王国维与此事的关系上写出了三篇文章,详细地探讨了这一事件。“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和屡屡阐述,说明学界对此有一定的关注,并未完全弃之不理。其实,还应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八千麻袋事件”。

台湾的陈以爱女士曾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主题写出了硕士论文,后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该书对北大的明清史料整理会略作阐述,给我们以提示,从其线索中可以去廓清当时北大整理明清档案的状况。而2007年第1期的《历史档案》上刊载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庾向芳的一篇文章《陈垣为故宫文献馆购入端方档案时间考》,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了陈垣先生当年为故宫文献馆购买端方档案的具体时间,驳斥了流传的不正确的说法。历史界对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一方面给我们以启发和教导,另一方面,也督促档案界要奋起直追,补上这一课。档案界有必要对此做一系统的研究,获取话语权,以期填补学术空白。我们的专业史不能永远空缺下去,需要有人来做,值得尝试。

3. 研究思路

对于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问题,包括理论与实践两大块。这是大的前提。而具体到整理过程中,可以按照条块结合来写。从早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禹贡学会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四个机构的整理,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整理,中间还有罗振玉一脉的整理。这是三大块。而每一块又有自己的整理过程,可以按照时间顺利来写。不过要厘清这几方面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北大整理的经验和教训直接影响着文献馆的整理,因为当时主持和参与整理的是沈兼士、陈垣等北大的一批学者。